我的观点与为本书作序的吴承明的相左，我倒是认为，本书写得最好的是第一部分，即中西近代的经济变化，正发挥了作者本科学习经济学的长处。或许“国家形成”的部分（中编）其实也并不逊色，只不过我是以历史学的眼光看出来其不足，而吴承明又是中国经济史学会的会长，各有所重。总的来说，前两编的整体视野较之下编“社会抗争”要更广阔些，社会抗争或许可以作为历史转折的重要一环与重大事件的导火索，但其本身的出发点毕竟还是有限，不能直接与上、中编相提并论。

在“经济变化”部分，大部分的内容更像是文献的综述。不过作者确实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跳出欧洲中心论的偏见，在整体性的中西比较中，否定、剔除了许多以往被认为是中国所没有的、因而不能自发进入“工业化时代”的因素，实际上在许多的方面，如马尔萨斯主义的限制、过剩劳动问题（黄宗智），中西在工业革命之前并不存在很大的差异，甚至是颇为相近。就像在之后的部分一样，作者没有对本部分所提出的最重大的问题，造成西方近代技术爆炸的独特原因，做出自己的解答，在一定意义上说，这也正是近代化发生的关键。作者对哲学思想的变化、政府干预对此所真正造成的影响提出了质疑，确实，现阶段尚没有足以令人完全信服的证据能够说明其间的相关性。

类似的尝试实际上或许在任何的领域目前都只有“不可证伪性”，毕竟历史试验的机会少之又少，我们往往所能做的无非是从不充分的信息中观察、总结已经发生的事情，加之以所谓“历史的玄想”。在这里笔者还是要提出自己的坚持，毋宁说是一种直觉式的不可靠的想法：对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国家而言，明清政府通过软（科举）、硬（文字狱）手段可见地对思想进行引导、控制，也许政府并不直接压制技术创新，但却并不存在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；其次，至少就目前已有的历史而言，在二十世纪哲学（西方哲学）进入瓶颈期之前，近代科学技术上的迅速发展与哲学思想的磅礴具有正的相关性，就算其因果关系有待怀疑，但足以值得重视。

至于近代国家的形成，在“近代化”问题上比之经济增长的原因重要性要稍次一些，后者是更关键的“因”。作者将明清的中国政府与罗马相比较是有其道理的，欧洲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是从中世纪越过了古典时期，明清的中国国家建构夹在近代与在中世纪之间，其近代化的过程无疑是被动多于主动。作者提出的近代国家形成的动力问题，是具有启发性的。